



论革命： 从革命伊始到帝国崩溃

[法] 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 编

曹胜超 崇明译 崇明校

论革命： 从革命伊始到帝国崩溃

[法] 托克维尔 著

[法] 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 编

曹胜超 崇明译 崇明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革命:从革命伊始到帝国崩溃/[法]托克维尔著;[法]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编;曹胜超,崇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9

(思想与社会·托克维尔著作系列)

ISBN 978-7-5426-5640-7

I. ①论… II. ①托…②弗…③曹…④崇… III. 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8061 号

论革命:从革命伊始到帝国崩溃

著 者/[法]托克维尔

编 者/[法]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

译 者/曹胜超 崇 明

审 校/崇 明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021-22895557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24.75

书 号/ISBN 978-7-5426-5640-7/K·388

定 价/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训练 孙向晨 任军锋
吴 飞 李 猛 林 晖
崇 明 渠敬东 黄 韬

总 序

λόγος 和 πόλις 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

成尾随者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中译本导言

自由的艰难：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

崇明

《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与帝国的宏大研究的一部分。1856年在该书出版后，他继续其关于革命与帝国的研究。很遗憾的是，他未及完成这一研究就去世了，留下来一些提纲、少数初步成型的章节和大量的笔记，主要讨论了1787—1789年以及督政府到拿破仑政变掌权这两个时期，少量涉及恐怖和拿破仑帝国。^① 这些散乱的手稿显然无法让我们重构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与帝国的完整思考，但是其中不乏深入的剖析。它们表明，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本身及拿破仑的论述与着重剖析革命起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表达了同样的关切：何以从反抗君主专制开始的大革命以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集权告终？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1789年的自由精神大加赞赏，同时指出法国人对平等的热爱最终压倒了自由精神。在这些手稿中，托克维尔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大革命中自由与平等的辩证法。在被他视为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的1787—1789年这一时期中，自由精神所激发的宪制斗争逐渐向民主激情所支配的阶级斗争转化。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Considérations sur la Révolution*,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 *Oeuvres*. François Furet and Françoise Mélonio eds. Tome. III, Gallimard, 2004, pp. 453-723, 1117-1187. (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均在引文后直接注明页码)

虽然他还没有能够对 1789 年之后到 1794 年的革命进程特别是恐怖展开深入研究,但是可以看出,他在分析革命的第一阶段时一直在民主激情和阶级斗争中探究革命的激进化和恐怖的根源。通过对督政府时期的混乱和拿破仑轻易掌权的分析,托克维尔指出革命的暴力与恐怖使法国人对自由感到恐惧和厌倦,而大革命带来的平等和利益则使他们始终热爱革命,因此继承了革命平等而取缔了自由的拿破仑得到了法国人的拥戴。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更直接地呈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旧制度、革命和帝国在集权与平等进程上的延续性,同时也初步对革命的历史断裂特别是革命进程的政治动力提出了富于洞察的阐释。

可能是由于托克维尔留下的手稿较为杂乱,他对大革命本身的论述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法国著名大革命史学者孚雷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以及《托克维尔文集》第三卷的导言中讨论了这一部分内容,但他过于强调托克维尔对革命与旧制度的连续性的关注,没有恰切对待托克维尔对革命动力的分析。^① 美国历史学者帕尔默翻译了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在其英译本导言中指出它揭示了托克维尔的贵族视野,但没有论及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激进化的分析。^② 埃尔斯特简要讨论了托克维尔对导致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的分析。^③ 卡汉的论述相比而言更为全面,把握了托克维尔对自由革命和平等革命的区分,但没有注意到托克维尔对自由革命内部张力的剖析,也未能讨论托克维尔对督政府以及拿破仑的分析。^④ 总之,以上研究均未能深入

① 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Gallimard, 1978, pp. 207 - 211. François Furet et Françoise Mélonio, 《Introduction》, in Tocqueville, *Oeuvres*, T. III, pp. lxxviii - lxxvii.

② Robert Palmer, “Introduction”, in Robert Palmer, ed and trans. *The two Tocquevilles Father and Son ; Hervé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on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 - 37.

③ John Elster, “Tocqueville on 1789 :Preconditions, Precipitants, and Trigger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 ed. Cheryl. B. Welch, Cambridge, 2006, pp. 49 -80.

④ Alan Kahan, “Tocqueville's Two Revolutions”,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6, No. 4 (Oct. -Dec. ,1985), pp. 585 -596.

把握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的理论和史学意义,而国内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论述。笔者认为,如果参照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呈现的政治理论和历史思考,并且结合当代大革命史学研究成果对其革命论述进行全面分析,我们会发现托克维尔在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及其暴力转化中把握了作为民主革命的法国大革命的本质特征。在分析大革命时,托克维尔继续采用了其政治和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从社会状况与政治组织和行动的互动来理解大革命这一宏大事件相对于旧制度历史的延续和断裂,同时在行动者的观念意图与历史进程的差距之间揭示革命的巨大政治动力的某种自主性。事实上,当代的大革命史学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的原创性。

一 贵族自由的空洞

托克维尔是最早指出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一场贵族革命的史学家之一。^①大革命开始于旧制度法国并不鲜见的一场上层政治斗争:1787年和1788年特权阶层特别是贵族利用财政危机为他们带来的政治机会,通过显贵会议特别是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的专制加以抑制,进而争取以贵族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民族自由。自由而非平等是这一贵族革命的主要特征:“人们提出的并非权利的平等,而是政治的自由。”^②但贵族所要求的政治的自由是立足于特权的贵族自由。

早在1836年,还在撰写《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时候,托克维尔就在“1789年前后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一文中区分了自由的贵族制概念和民主制概念。我们可以将这两者简称为贵族自由和民主自由。前者是对“某种特权的享用”,体现为贵族的独立;它是等级社会的产物,仅仅由少数人和阶层掌握。提倡贵族自由的贵族自由主义是18

① Robert Palmer,《Introduction》, in *The two Tocquevilles Father and Son : Hervé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on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1.

② Tocqueville, *Considérations sur la Révolution*, p. 467.

世纪法国的重要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布兰维耶和孟德斯鸠，主旨是重建贵族的政治权力，借助地方自治、三级会议和中间性政治团体遏制王权、领导民众。^① 贵族自由以团体主义社会观为基础，在维持等级和团体之间的区分时注重等级的分工与联合，但强调特权特别是贵族的政治领导地位。民主自由则首先体现为平等的个体自主权，因为每个人都被认为从自然那里获得必要的能力来处理自己的事务，而集体事务的处理则需要所有人的同意。^② 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指出从民主自由中引申出来的政治原则是人民主权。^③ 贵族自由因其狭隘和不平等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而民主自由则因其普遍和平等而是公正的。^④ 1787年到1789年的政治发展呈现为民主自由取代贵族自由并确立人民主权的进程。

在1787年和1788年的贵族革命中，很多贵族仍然维护各种立足于地方、阶级和团体的传统特权，以此来彰显独立、约束王权并维持对第三等级的支配。同时他们诉诸民族权利来反对国王的绝对权力，尤其抱怨“各省的三级会议遭到取缔，全国的三级会议遭到终止，整个民族被置于监护当中，国家被剥夺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479—480，482）。贵族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对王权进行民族监督，征税须得到整个民族的批准。贵族进而声称自己是国王和平民之间的中间制衡力量，是民族的中坚和领袖，因此希望借助三级会议恢复其政治特权，而作为交换他们可以放弃他们认识到已经不合时宜的免税特权。所以贵族坚持在三级会议中各等级单独议事并按等级而非按人头投票，从而获得对第三等级的政治优势。由此可见贵族革命是明确的追求

① 孟德斯鸠的思想较为复杂，可以做现代自由主义的解读，这里涉及的是18、19世纪比较流行的贵族自由主义的解读。关于18世纪的贵族自由主义，参见 Annelien de Dijn,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from Montesquieu to Tocqueville: Liberty in a Levelled Society?* Cambridge, 2008, pp. 11–39。

② Tocqueville, “Etat social et politique de la France avant et depuis 1789 (《1789年前后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in Tocqueville, *Oeuvres*, t. III, p. 35。

③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民主在美国》), Ed. Eduardo Nolla, Vrin: 1990, Tome I, p. 303。

④ Tocqueville, “Etat social et politique de la France avant et depuis 1789”, p. 36。

贵族自由的革命。^①

不过贵族的反专制和民族话语使他们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国王在 1787 年和 1788 年推行削弱特权、强化平等因而是有利于民众的改革,由于特权阶层反对而流产,但民众依然在贵族革命中站在了特权阶层一边。这里托克维尔回到了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的核心问题: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绝对主义君主制对社会的长期干涉和压迫造成了社会对国家的普遍不满,引发了民众对王权政府的敌视:“很长时间以来,政府患上了一种疾病,就是那种试图掌控一切、预料一切、操纵一切的权力的常见却无法治愈的疾病。政府对一切都承担责任。无论人们因为抱怨的对象不同而产生多大的分歧,大家都愿意聚在一起指责政府;在此之前,那还只是一种人心的普通倾向,这时却突然变成一种普遍的、澎湃的激情……一时间,对专断的仇恨变成法国人唯一的激情,政府成为共同的敌人。”^②认为国家应该并且能够控制一切的国家主义导致民众和社会认为国家应该对一切问题负责,^③而一旦遭遇危机,政府就可能被视为罪魁祸首而受到社会的普遍攻击。在托克维尔看来,认为可以通过全面控制社会而建立强大政府的国家主义最终恰恰可能建立一个基础脆弱的政府。^④ 1787 年危机中法国社会在税收问题上对王权的抵抗证实了这一点。政府推行的土地税和印花税改革打击特权而有利于民众,但却遭到很多维护自身

① 关于贵族的政治观念和诉求,参见 Vivian Gruder, *The Notables and the Nation: The Political Schooling of the French, 1787-178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7-73, 82.

② Tocqueville, *Considérations sur la Révolution*, p. 470.

③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已经谈到了这一问题:即便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灾害,民众也认为应当由国家负责。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in *Oeuvres*, T. III, p. 112.

④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指出君主制行政集权和分而治之的统治术所造成的阶级分裂导致“没有什么能被组织起来制约政府,但同时也没有什么组织起来帮助政府。因此,一旦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开始震荡,君主们的宏伟大厦会顷刻间全盘崩溃”。“在这些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对自身的孤立和虚弱感到恐惧;它希望在这时能恢复被它摧毁的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它号召它们来帮助它;没有人响应,它通常会吃惊地发现这些人已经死了,而且是它亲手把他们杀死的。”Ibid., pp. 163-164, 167-168.

特权的贵族及高等法院法官的反对，但是他们在税收问题上对王权的批评迎合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① 在旧制度时期，由于政府可以不经国民同意征税和使用这一税收，而税收来自国民的财产，因此国民无法掌握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的运用。结果，民众普遍把税收视为官员和包税人对民众的一种掠夺。在这种背景下，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均声称，只有整个民族才有权利同意新的赋税，三级会议被认为是解决财政和政治危机的唯一道路。这时他们立刻得到了民众的支持。^② 所以，虽然国王推行的土地税改革符合国家利益，尤其有利于并非土地所有者的民众，但国王推行改革的权利遭到了高等法院与法国社会的质疑。国家主义的困境在于它追求的全权政府的正当性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在危急时刻，控制民族的政府将面临试图控制政府的民族的挑战。

所以，对王权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某种政治联盟，它暂时遮盖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英国历史学者 John Hardman 指出，在 1787 年，公共舆论并非没有注意到显贵对其利益和特权的捍卫，但他们认为王权的专制是最大的敌人，因此试图借助显贵来打倒这一专制。^③ 在 1788 年 5 月到 8 月高等法院与王权的斗争的高潮期间，大多数爱国派很清楚高等法院的特权立场，但是他们看到后者的

① 18 世纪法国民众对所谓大臣专制 (ministerial despotism) 的憎恨源于国家对日常生活的过多干预，税收就体现了这一干预，譬如政府为了收入城税于 1785 年围绕巴黎修筑城墙，对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这是民众往往支持高等法院反对王权的重要原因。J. B. Collins,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Cambridge, 2009, p. 297.

② 托克维尔指出了 18 世纪后期所形成的民族性的公共舆论的强大。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不再仅仅是上层精英的事，而是在整个社会中展开。所以，虽然高等法院对王权的批评不过是延续其一贯的做法，“但听众扩大了，这次争论没有局限在从前因为享有特权而对赋税不太敏感的阶层，而是产生很大动静而且不断重复，到最后传到饱受赋税之苦的人们耳中，并燃起他们的怒火”(474)。旧制度末期，围绕税收的个人和社会财产性质的辩论促进了民主和代议制理论的兴起。Gail Bossenga, "City and State: An Urban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ed. Keith Baker, Pergamon Press, 1987, pp. 133—134.

③ John Hardman, *Overture to Revolution, The 1787 Assembly of Notables and the Crisis of France's Old Regime*, Oxford, 2010, p. 286.

反叛打开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自由之路，因此他们与之联合来反对王权。^① 而一旦王权被打败，阶级矛盾就暴露出来。1788 年下半年，在三级会议召开问题上，贵族和高等法院顽固捍卫教士和贵族的政治特权，这导致特权阶层彻底丧失民心，他们在一度成为民族领袖之后，又迅速被第三等级抛弃。

托克维尔批评贵族没有认识到贵族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根基：它和旧制度的许多残余的自由一样是“混乱的、病态的”，足以促成专制的颠覆，却不利于法治的建立。^② 在中央集权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贵族保留了特权而失去了实质性特别是领导民众的政治权力，^③ 沦落为封闭狭隘的某种种姓制度。捍卫贵族特权、在 1787 年、1788 年上层革命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的高等法院就经历了这种沦落。在其诞生初期，高等法院法官中不乏出身卑微贫寒的优秀法学人才，被托克维尔视为中世纪精英贵族制社会中最强大的民主机构（488—489）。^④ 对于托克维尔而言，精英贵族制（aristocratie）容纳某种平等和社会流动，因此不是封闭的，并且能够在维持贵族统治的同时使得这一统治因其开放而得到社会的认可并成为社会的纽带。只有当精英贵族制逐渐蜕化为狭隘的寡头式甚至是种姓式贵族制（noblesse）时，后者的排他性破坏了贵族制的社会纽带功能，造成了贵族阶层和民众之间的社会断裂。^⑤ 不幸的是，高等法院逐渐堕落为这样一种狭隘的寡头机构。当然，高等法院的寡头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王权的扭曲的财政制度。国王为了获取财政收入而实行的捐官制导致高等法院被一些出身富

① Jean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法国的预备革命 (1787—1788)》),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pp. 277—278.

②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 154.

③ “那些阶级却只保留了权力的外表；我们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失去了权力的实质。它们变成某种空壳，虽然貌似强大，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它们仍然可以搅动民众，却已无力领导他们。”（468）

④ 正是因为高等法院的这一民主性，在 1614 年三级会议中，贵族迫使高等法院法官代表和第三等级坐在一起。J. B. Collins,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304.

⑤ 关于这两种贵族制的区别，参见 Tocqueville, “Etat social et politique de la France avant et depuis 1789”, pp. 7, 16—17.

裕的家族控制，而这些家族把高等法院的职位变成他们的特权加以垄断和传承(489)。高等法院的扭曲不过是旧制度精英贵族制的寡头化变形的集中体现罢了。

不难理解，到了1788年下半年，贵族领导的革命迅速转化为反贵族的革命，贵族在成功地打败王权后成为自己发动的革命的牺牲品。这是因为他们要求的贵族自由固然在王权衰弱时是对抗王权的有效武器，但它严重背离时代潮流而必然被淘汰。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曾明确指出，在正在来临的民主社会中，“所有试图把自由建立在特权和贵族制之上的人都将失败。所有那些试图在一个阶级内部吸引和保留权威的人也将失败”^①。大革命中贵族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二 精英自由的含混

在托克维尔看来，王权与贵族以及高等法院在1787年和1788年的尖锐斗争和相互攻击事实上宣告了旧制度政治体制的破产(475, 1138)。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国家主义和贵族自由主义的困境为精英自由观念和激进的民主自由观念的兴起提供了机会。然而，这两种自由主义也遭遇了失败。

事实上，旧制度后期，国王和某些大臣已经认识到过度的中央行政集权的弊病。但是直到1787年，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政府才推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地方行政改革，目的是给予有产者精英特别是土地所有者有限的政治自由，以某种代议制来巩固君主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及后续论述中对这一改革进行了分析，指出它几乎是一场行政革命，动摇了旧制度的基础。最初推行改革的卡罗纳所构想的地方议会将无视等级区分，以财富为基础，由有产者代表组成，并且排斥教士的传统影响。这在托克维尔看来意味着“在贵族和教士等级

^①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T. II, p. 271.

之外建立整个法国的行政系统”，甚至是以民主共和国取代封建君主制的残余、民主取代贵族制、共和国取代王国，可以说是对旧制度的一种摧毁(475)。^① 其实，卡罗纳本人丝毫无意于改变法国的政治体制。他所要建立的省议会不过是咨询机构，在税收和地方行政问题上来辅助国王作出决定，然后以其通过民选获得的合法权威来保证国王的决定得到执行和贯彻。所以，地方议会绝不是体现行政权力和地方自治的机构。忽视等级区分仅仅是为了保证省议会能更充分地代表有产者纳税人，从而便于征税。卡罗纳根本不打算把省议会中的等级混合扩展到法国社会中去，在他看来前者中等级区分的淡化和法国社会中这一区分的维持可以并行不悖。^② 托克维尔显然认识到，这种有产者的自由一旦得到承认，它不可能像卡罗纳希望的那样只被局限于地方议会当中而不扩展到整个社会并转化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的诉求。^③

确实，卡罗纳在显贵会议上提出该方案后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反对。这种偏重财富而无视传统等级差别的方案像托克维尔理解的那样被大多数代表视为对法国宪政的颠覆。^④ 接替卡罗纳的布里耶纳(Birenne)推行的改革接受了这些反对意见，维持了等级的区分，由特权阶层的成员主持。在托克维尔看来，布里耶纳建立的省议会给予第三等级双倍代表人数并且按人头投票，这已经是一项重大变革。他指出，最初是国王和大臣提出了第三等级代表数目翻番。正是政府自己为第三等级准备了革命武器，后者日后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召开全国三

① 参见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 223. Jean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21.

② John Hardman, *Overture to Revolution*, p. 297.

③ 参见托克维尔对杜尔阁 1775 年建立咨询议会的建议提出了批评：在社会普遍期待改革的时刻，这种行政性而非政治性的半吊子改革必然失败，只会激起民众的期望而无法予以满足，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 175.

④ Jean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22 - 23; Vivian Gruder, *The Notables and the Nation*, p. 66.

级会议(495, 507)。^① 此外,政府并没有处理好这一准代议制与传统行政集权体制的关系,结果省议会与总督的冲突以及集体行政权力的低效共同导致了地方的行政混乱。^② 更重要的是,这一改革在教区层面也就是在农村里造成了秩序的混乱和阶级的冲突。政府没有看到的是,在地方政治生活被长期剥夺以及在农村中存在着免税特权所造成的严重的纳税不平等的情况下,这一有限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第三等级中的有产者的地位,但必然造成它与其他两个等级的冲突。在以第三等级为主体的教区会议中,贵族和教士代表在很多问题如纳税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们和某些富裕平民甚至会被教区会议和乡镇会议拒绝接纳。^③ 这一改革本想通过提升第三等级特别是有产者的地位来形成阶级之间的合作,但反而造成阶级间的仇恨和冲突。^④ 这一改革甫一推行就不得人心,困难重重,托克维尔认为其失败和引起的不满应该归因于“各阶层的法国人在领导大小事务中极端缺乏经验,以及他们反感被他们的邻居而非共同的主人来治理”(525)。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对旧制度法国的政治精英的批评:即使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人物或者国家领导也缺乏对政治的理解。对于理解政治而言,重要的不是在任何一种政治治理中获得的政治经验,而是政治自由。^⑤ 政治自由的缺乏使得他们往往无法认识到社会参与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结果他们很容易陷入到对国家和集权的迷信;而当他们认识到社会参与的必要性

① 参见 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1.

②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p. 218-220. Pierre Renouvin, *Les Assemblées provinciales de 1787: origines, développement, résultats*(《1787年省议会:起源,发展,结果》), Paris, 1921, p. 251.

③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 222. 这一改革同样揭示出特权等级对第三等级特别是平民的不信任和敌视, Pierre Renouvin, *Les Assemblées provinciales de 1787*, pp. 181-182.

④ 这一冲突事实上成为对第三等级精英的政治教育和动员, 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pp. 81-82.

⑤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p. 174-175.

时,又往往不知道如何为社会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并且引导社会阶级之间的合作。1787年地方行政改革像路易十六及其大臣试图推行的很多其他改革一样在根本上都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改革,但因为统治者缺乏政治智慧而失败。^①同时托克维尔也指出,如果一个民族长期缺乏政治自由和阶级合作,当它突然获得机会运用这一自由时,往往不知道如何加以运用。法国人不愿意被邻居治理,这首先是中央集权和特权政治造成的社会断裂和狭隘的团体主义的结果,其次是政治自由的缺乏导致法国人没有在共同的政治生活中养成彼此合作、妥协的政治文化。^②这两个方面相互激发,不信任、嫉妒、怨恨乃至仇恨支配了法国社会中不同团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当遇到社会和政治危机,这些彼此嫉恨和敌对的法国人被迫走到一起时,冲突乃至战争往往难以避免:“要让在几个世纪中形同陌路或彼此为敌的同胞公民相互靠近,并教导他们共同掌管自己的事务,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六十年前,当分割旧法国社会的各阶级在被诸多障碍长期相互隔离后要彼此接触时,他们触到的首先仅仅是他们的痛处,他们聚在一起仅仅是为了相互厮杀。”^③

托克维尔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平等原则为旧制度末年法国的阶级冲突提供了思想燃料。1787年行政改革承认的精英自由包含着有限但明确的平等诉求。托克维尔经常在其政治论述中指出,平等一旦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它将不断扩张其范围,进入到各个领域,并且挑战和突破既存的种种不平等。当有产者精英可以因为财产而与昔日的特权阶层在某个机构中取得平等时,他们必然会逐步要求把这一平等扩展到其他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财产资格的正当性也会被视为特权而遭到质疑,人们将谋求突破财产的限制而把平等界定为所有人的自然权利,从而以民主自由来取代有产者的自由。

① 此外,由于其失败而导致很多法国人对政府的改革能力感到失望,因而把改革希望寄托于三级会议。因此这一不成功的改革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② 参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第二编第九章和第十章的论述,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p. 121-143.

③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 143.